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七辑)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

EDITED BY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N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七辑)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

EDITED BY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N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7辑/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5272 - 0

I. ①哲… II. ①吉… III. ①哲学理论—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742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63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孙正聿

副 主 编 孙利天 贺 来

执 行 主 编 王庆丰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南湜 万俊人 李德顺 孙正聿

孙利天 陈 来 吴晓明 衣俊卿

张一兵 张 盾 杨 耕 俞吾金

赵敦华 姚大志 贺 来

◆ 目 录 ◆

◆ 本刊专稿

《跨越性批判》的结论部分 柄谷行人著 由阳译 (3)

◆ 纪念高清海先生逝世十周年专题

“类哲学”：价值世界的理论奠基

——高清海先生晚年哲学思考的再理解 王南湜 (25)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新的探路人

——纪念高清海先生逝世十周年 何 萍 (49)

“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曙光 (68)

追随“思”，为了“人”的觉悟和中国哲学的觉醒

——未完成的“高清海哲学” 田海平 (79)

突破教条、回到根本、畅所欲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高清海与孙正聿先生

学术思想为例 刘怀玉 王 巍 (87)

高清海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启蒙 邹诗鹏 (102)

类哲学的生命隐喻

——纪念《“人”的哲学悟觉》出版十周年 马天俊 (113)

◆ 现象学研究

“我是谁?”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现象学探索 龙 晶 (123)

现象学的“事情本身”:从胡塞尔到德里达 王庆丰 (149)

◆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

黑格尔哲学中的神学维度 丁 宁 (165)

先验演绎与“现象学演绎”

——康德和黑格尔对概念客观有效性的论证 张艳辉 (177)

◆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高广旭 (191)

货币的本质

——从《巴黎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雪 婷 (201)

◆ 哲学视域中的民族文化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概念反思 邵 然 (215)

西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和谐的丰富意蕴

——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 孟亚凡 (224)

◆ 书评

诗意地栖居何以可能

——读孙正聿《人的精神家园》 张晓明 (235)

思想史研究的“旧途”和“新路”

——张盾、田冠浩新著《黑格尔与马克思

政治哲学六论》述评 张添翼 (240)

本刊专稿

《跨越性批判》的结论部分^{*}

柄谷行人 著 由 阳 译^{**}

有一种批判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不适用于他之后的时代，而另一方则一直致力于“创造性”地发展《资本论》。不过，这和我到目前为止进行的尝试^①并不相同。马克思当然没有考察过帝国主义、股份公司（资本和经营的分离）、金融资本、凯恩斯主义等事物；但是，这些果真是马克思根本没有想到的新奇事态吗？其实，在形式上，它们在产业资本主义确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例如，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开始于19世纪末以资本输出为特征的金融资本时代。然而，所谓金融资本乃是借贷资本（银行）和垄断的产业资本的勾结形态，但在形式上它在重商主义时期就已经存在。另外，帝国主义在重商主义=绝对主义王权时代就已经出现。它和古代、中世纪的“帝国”不同，当时就已然以商品经济的原则为基础。英国的自由主义就成立于重商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成果之上。

金融资本的统治和帝国主义之所以看上去仿佛是新奇事物一样，是因为伴随产业资本主义的确立或者古典经济学式的思考，先在的形式被压抑下去了。古典经济学派把国家和商人资本简单地看成次要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国家（政治）和经济被分离开来，仿佛市场经济是自律的体系一样。然而，自由主义是在国家和商人资本相互勾结的重商主义的基础上，通过抑制它而成立的产业资本意识形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除英国以外）并不新鲜，现

* 本文原载〔日本〕太田出版社2000年版《可能的共产主义》第一章。

** 作者简介：柄谷行人（1941—），男，日本近畿大学荣休教授。由阳（1987—），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博士生。（吉林 长春，130012）

① 本文是在《群像》1998年9月号—1999年4月号期间连载的《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的结论部分（1999年4月号）的基础上大量修改、润色后而成的。

在亦然。此外，产业资本主义的无国界发展凭其自身是不可能消解各个国家的。因为不论产业资本是多么多国籍性的，在根本上它都以国家为依据。产业资本也无法排除商人资本性质的东西，因为它在根本上就是商人主义。

和那些把后来的事态结合起来而“发展”的理论相比，毋宁说，《资本论》更符合新自由主义这一事态。不过，《资本论》的预见性不是因为马克思要预测未来，而是因为他要追溯到产业资本确立以前的“形式”那里思考。我曾经说过^①，为了考察产业资本，必须回溯到商人资本的形式。商人资本从价值体系的差异中获取剩余价值。而产业资本也是一样。只不过，前者从给予的空间差异那里获取剩余价值，后者则通过时间的差异化来获取，通过制造新的空间差异来获取。但这并不会妨碍产业资本从事商人资本的活动。对资本而言，剩余价值不论从哪里获取都无所谓。

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划分为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四个历史阶段。但是，如果认为它们之间有什么根本性变化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例如，劳动者多数转移到服务部门和销售部门、脑力劳动变得重要等状况，这些被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关于“产业资本”，马克思是这样说的，“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资本论》第二卷）。“但是，有一些独立的产业部门，那里的生产过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的产品，不是商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经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的传递。……它的场所变动，也就是它所进行的生产过程”（同上）。在这个意义上，剩余价值不论是从“物”那里获得还是从“信息”那里获得都没有半分区别。产业资本的主要领域即便转移到了“信息产业”，资本的性质方面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说过，信息就是“差异”。

马克思区分了一般生产和价值生产。一种劳动是不是价值生产，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而在于它能否生产“差异”。所以，劳动形态的变化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马克·波斯特主张用“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的概念代替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信息方式论》，室井尚·吉冈洋译，岩波书店1991年版）。但是，这一概念虽然是对从生产看历史的“历史唯物论”的修正，却无法成为对《资本论》的批判。因为后者研究的是信

^① 参考连载论文，《群像》1998年12月号。

息（差异）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把社会组织起来的那种力量。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关注消费社会下的商品的多样化以及蛊惑性效果，仿佛那会导致对《资本论》的决定性的修正。他们援引本雅明的话，即“新奇是不依靠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一种品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第三部第五节，此处引用张旭东的译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然而，新奇就是差异——信息。资本不仅要生产产品，还必须生产价值（剩余价值）。总而言之，只要我们站在剩余价值来自差异的生产这一立场上，就会发现以上种种根本不是什么新认识。当我们思考“资本”时，我们必须始终从商人资本的范式（ $G-W-G$ ）出发。它会让我们明白，产业资本主义的阶段性质变，在形式上毋宁说正是之前的资本形态的“被压抑物之回归”。

这样，马克思对产业资本主义的考察追溯到了“大洪水以前就有的”商人资本和借贷资本。他认为比起商人资本，借贷资本 $G-G'$ 才更具备资本的本性。不过，这种观念论的世界能否成立，取决于借贷资本最终是否完成 $G-W-G'$ 的过程。这里最重要的是 $W-G'$ 的这一“惊险的一跃”。它暂时被决定销售的“信用”规避了。反过来，这个“信用”又带来了借贷资本 $G-G'$ 。世界市场正是这种信用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成立的状态。我们绝不能忘记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种信用体系中开始的。

随着产业资本的发展，人们开始把这种商人资本和借贷资本看成是次要的东西，还认为货币只表示价值。古典经济学把价值还原为投资劳动，由此使利息、地租等“信用”世界祛魅了。从这里，李嘉图左派抽出了李嘉图的利润理论中包含的可能性、即利润就是剩余劳动之榨取的思想。这一思想屡次被误认为是马克思的“发现”，可是，毋宁说，价值和剩余价值最终在流通过程中得以实现才是马克思的“发现”。简言之，无论生产过程如何，只要没卖出去就既没有价值也没有剩余价值。新古典学派认为马克思是古典学派的传人，并否定了他的劳动价值论，说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然而，马克思重视的其实是使用价值（效用）。产品如果首先对他人来说不是使用价值，就不可能是价值。我在后文中将详细论述，价值在生产过程中是透明的这一古典学派观点被马克思主义继承时究竟产生了何种误解。在这里，我姑且再次强调，马克思的关注点和古典学派相反，他关心的是流通过程。

从前，站在商人资本的基础上思考的重商主义者不关心那种社会性的生产过程，他们只关心仅由货币或商品形态所组织的产品。这种目光的确流于表面。但是，反过来，虽然这个表面是作为不同于生产的独立层次由其倒错

的形态（货币的拜物教）构成的，但是他们可以把握到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和他的叙述顺序相反，他首先追溯到古典经济学视为次要的商人资本、守财奴，然后追溯到货币和商品，并在根源处发现了“价值形态”。因此，“价值形态”并不是逻辑性发展的起点，它是由于在（古典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意识中总是消失无踪，所以必须回溯去发现的形式。相对价值形态（商品）和等价形态（货币）的非对称关系在本质上与交换同行，它意味着交换的困难。这里还产生了资本的欲动。资本的欲动不在物的积累中，而在交换可能性的权力的积累当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绝不在于对个别的物的欲望，而在于对无论何时都可以获得全部物的“权力”欲望，因此毋宁说在于对个别的物的欲望的断念之中。

古典学派不区分产品和商品。换言之，他们不关心使产品成为商品或货币的“价值形态”。在他们看来，产品不经过交换仅通过劳动创造就具有价值，其价值由货币表示。古典学派不去思考产品仅通过货币来交换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无视货币，就是无视资本。产业资本的理论家厌恶“资本主义”这个词汇，他们更愿意使用“市场经济”。他们通过这个词来表征人们正在市场上进行物物交换的样子。这个概念同时还掩盖着资本的积累运动。当市场经济发生混乱时，他们甚至把它作为带来混乱的东西来弹劾投机性的金融资本，仿佛市场经济不是资本积累运动的场域一样。

我们应该注意，首先否定重商主义的是重农主义者魁奈（《经济表》）。他认为土地的自然力是利润的源泉。换言之，他否定由价值形态形成的世界的自律性，并认为财富的源泉是自然的生产力（自然的赠与）。古典学派基本上承袭了魁奈的思路。只不过，他们把自然的生产力替换为来自人类分工的生产力。这个替换包含了只有人类劳动才能形成价值的观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这种古典学派——拉萨尔式的思想，并强调不仅人能生产，自然也能够生产。他的判断不单是为了批判拉萨尔对地主阶级的暗地拥护，还是贯穿《资本论》的重要认识。“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资本论》第一卷）。

这关系到资本要依靠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但其自身又无法创造它们的问题。不过，关键仍然在于，无论是人的生产还是自然的生产，都是由价值形

态组织起来的。重农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派都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把价值生产和物质生产混为一谈。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文明的混淆。这种混淆还产生了把产业资本主义引发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近代工业、工业技术的问题的态度。^①

古典经济学家重视劳动的确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这种视角不仅导致了人们轻视由“交换”的困难引起的货币和信用世界的维度，还带来一种能够透视社会性交换的错觉。它把货币实现的社会分工和工场内的分工同一化了。这种同一的结果就是像工场那样有计划地统辖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这显然不是局部或暂时就能完成的。通常，它的失败最明显地表现在农业问题上。因为一部分以“自然的生产”为基础。但是，失败的原因乃是轻视伴随交换的本质性困难。并且，最重要的是，那种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看法，即试图有意识地控制自然发生的、无政府的东西的看法乃是从古典经济学派的思考方式中派生而来的。他们不曾像马克思那样深刻思考为何交换必须依赖货币的问题。

历史唯物论者思考自然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是如何历史性地变迁的。但是在这里，历史唯物论者遗漏了对于把它们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考察。因此，我们必须关注“交换”的维度以及它采取价值形态的不可避免性。重农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采取了从“生产”出发透视一切社会关系的视角。然而，对我们来说，社会性交换常常表现为不被渗透的、因而也是独立的力量，因此并不容易舍弃。

资本就如马克思所言，它的卖（W - G）和买（G - W）在空间和时间上分离时发生。这种分离不仅带来剩余价值，还会引发信用危机。但是，倘若没有这种分离，直接交换就没有可能。自卢卡奇以来，兴起了在资本主义

① 所谓土地和人类的再生产乃是“自然的生产”，是自然的“赠与”。反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强调“血缘和大地”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它们是自然赠与的 *geschickt*，故而是命中注定 *schicksal* 的。海德格尔在“它给予 *es gibt*”这个德语语境下考察“存在”的存在论，和魁奈以来的农本主义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海德格尔绝不是简单的“森林人”。他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他想解决产业资本带来的工人问题。他否定纳粹的生物学家种理论的反犹太主义是反商人资本主义（反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确切说来，他的思想回到了古典派的理论。只不过，他的思想是以“生产”为支撑，并试图在与“自然的生产”融合的前提下实现的东西。法西斯主义是在维持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在劳动中给予“被异化的”工人以充足的闲暇，试图恢复自然环境带来的“本性”的运动。它并不必然会与战争勾连。所以，如果把它在历史上的特殊性抛在一边，那么，虽然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不得不说法西斯主义即便在今天依然会有势力。

经济制度下，人和人的关系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的“物象化”理论。但是，这种看法其实来自于匠人（单纯的商品生产者）意识和封建的阶级关系的意识。对他们来说，此前的渗透关系看上去被“物象化”了。可是，商品经济下的人的“社会性”关系毋宁说是由资本形成的，从一开始就是通过物和物的关系来表现的。原本我们相互之间是无法得知与谁关系着的。但是，正是这种“分离”把被共同体和国家封闭的个人“社会性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国际都市。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我们虽然无法得知相互之间的关联，但同时也不能再说我们之间是“无关系”的了。比如，当今世界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处于饥饿状态，但不能说发达国家的人们与此“无关系”。只不过无法明示这种“关系”。因此，原本的渗透关系的世界被物象化等想法只是一种事后性的反观。它疏忽了“社会性关系”由资本构筑的事实。^①

不过，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无法随意处理的“外部”，它就是作为土地（广义的自然环境）和劳动力商品的承担者的人。宇野弘藏在资本本身无法生产出劳动力商品这一点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劳动力商品不只是商品。不能因为需要就增加，也不能因为不需要就把它舍弃。劳动力不足会使工资上涨从而利润率下滑。可是，它虽然会使经济景气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却无法使资本主义经济停止。资本通过“产业预备军”解决劳动力的稀缺。国内的农业、中小企业以及不发达国家便发挥这样的作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当劳动费用上涨时，就会从海外招徕劳动力，或者向海外转移生产。总之，这一“界限”仅仅意味着资本积累必须经历经济危机和经济景气的循环才能实现，资本由此得以长存。

同样的情形也可以用来说明环境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在最近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瓦解了人类长期以来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农业自然环境的再生产（再循环）系统。结果，环境污染成为全球性问题。但是，仅把它理解成工业技术或近代“世界观”的问题，这是片面的。马克思早就思考过环境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

^① 物象化理论暗地里把洞察一切生产关系的观点作为前提。因此，这种思想在实践上和它的意图相反，最终变成了中央集权的权力统制。

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论》第一卷）

可是，《资本论》中重要的并不是工业和农业的区别，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一般生产的区别，或者是由价值构建的世界和并非如此的世界的区别。商品化虽然和工业化有关，却是另外一回事。关于环境污染问题，一些人认为应该改变以前的战胜自然的思维方式并采取“与自然共生”的态度。这时，前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农业共同体）作为理想模式受到了人们的好评。然而，这种看法只是先进国家的人们的浪漫主义梦想罢了。因为，现实的环境污染的危害，在“与自然共生”状态下的后进国家那里表现得最为残酷。

环境问题本身无法成为阻止产业资本主义的力量。现实里，阻止环境污染的最有效方法是把处理废物的成本——如征收二氧化碳税——投入生产成本之中。这种方法把此前被看作自由财富的东西理解为商品。自亚当·斯密以来，空气和水被认为是具有使用价值但无交换价值的代表性例子，但是今天它们正在成为商品生产的对象。就是说，环境问题将归结为商品经济和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化。结果，环境危机和粮食危机将带来新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

我们无法通过对话和共识停止资本的欲动。因为它就是在交换过程中的“对话和共识”的困难本身中孕育出来的。有一些人冷嘲热讽，说还是通过商品经济进一步彻底化来期待转机为妙。可是，商品经济彻底化达到极限，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逆转。而一旦它无法实现剩余价值，资本必将终结，这是毋庸置疑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资本论》第三卷）。但它不是自然地停止。因为无论以何种形式——不管伴随多少悲惨和荒芜——它都要继续制造差异。《资本论》明确的是资本（理性）的“界限”。但它不能停止资本的欲动。因此，必须存在与资本运动对抗的运动及主体。我们能否在《资本论》中发现它们呢？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只有作为资本（货币）和劳动力（商品）这一对经济范畴的“承担者”才能被发现。大体说来，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经常提及《资本论》，事实上却对它不满。因为在这里很难找到主体性的实践契机。但是，这根本就不是《资本论》的缺

陷。《资本论》是以“自然史的立场”、即“理论性”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这里不会出现主体的维度，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宇野弘藏说《资本论》阐述的是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非革命的必然性、革命是实践性的问题，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但是，这种“实践性”毋宁说应该在康德的意义上思考。就是说，对抗资本运动的运动的“道德性”的。^① 对抗资本运动所带来的榨取、异化、不平等、环境破坏、女性歧视等现象的运动是“道德性”的运动。因此，在这一点上，对早期马克思的重新评价是十分合理的。的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每个人的“责任”加上括号予以悬置，但这并不是在否定道德的层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以道德性的东西作为契机，马克思本人也是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马克思指出了无视“自然史的过程”的道德运动必然会遭受挫折。在《资本论》中，他抓住了对抗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关键，那就是经济范畴本身。

马克思执笔《资本论》期间，在产业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最为发达的英国，革命运动已经式微。他虽然对其他地区的革命寄予厚望，但在根本上，他仍然认为如果英国不发生革命那么资本主义的扬弃就无法实现。因为，在产业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尚不成熟的周边后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革命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革命——只不过由于那些地方没有资本家，所以常常由社会主义者代行其职。这是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内部的事件，因此本质上无法成为与其对抗的东西。对于《资本论》撰写期间的马克思来说，显然英国的工人阶级不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他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认为经济危机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但到了撰写《资本论》时期，他早已放弃了这种期待。

① 社会主义也是在美学态度中开始的。这一点在谴责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丧失喜悦的罗斯金那里已经能够看到。威廉·莫里斯从这样的美学角度接近马克思主义，并发现了劳动即艺术那种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过，在这里不能在狭义的意义理解“艺术”。无论何种劳动，如果把“关心”打上引号，它就是游戏且与艺术活动相似。马克思这样写道：“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描绘未必就是非现实的。例如，志愿者高兴地承担了从经济上的交换价值，或者从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这个自古以来的价值等级秩序的角度来看是下等和肮脏的工作。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把这些工作当作职业来做。这证明了使劳动成为痛苦的，并不是劳动的性质，而是使劳动单纯从属于对交换价值的“关心”的那种经济。

现在，在我们阅读《资本论》时，我们不应该关注里面那绚烂华美的浪漫主义革命的预想，而应该注意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工人运动亦被吞噬其中）当中试图发现的能够与之抗衡的逻辑。特别需要留意的是，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的“发现”的剩余价值论其实是李嘉图左派的东西，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派的批判正包含了对它的批判。19世纪上半叶的宪章运动以及后来的体制内部的工会主义，都是重视生产过程并从中发现剩余价值榨取的理论引发的。只要坚持这种理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就必然不会出现抗衡资本主义的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在此从“物象化”，乃至作为意识形态装置的国家的主导权来寻求工人运动体制化的原因。然而，重视上层建筑的观点在根本上以生产过程中心主义为基础。分析大量生产、高额工资、大量消费的福特主义式的“消费社会”的那些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资本论》并不是一部关于经济基础的著作，它是一部考察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框架之内无法思考的那种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组织起来的某种“力量”的著作。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也必须从这里发现。

在这里，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产业资本以劳动力商品为基础的含义。它不仅意味着雇佣工人使其劳动。真正内涵在于，在工人制造的产品最终由工人购买——虽然工人购买的是消费品，但如果不销售它就无法销售生产材料——的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就是说，剩余价值 = 资本积累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在流通过程中也首次得以实现。《资本论》区别于古典派的地方就是对这样的流通过程的重视。对于古典派来说，那不成其为问题。他们以供给（生产）自行创造需求（消费）的萨伊定律为基础。凯恩斯嘲笑马克思仰仗萨伊定律，但这不过是无知以及诋毁性的误解而已。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否定萨伊定律并批判了只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寻找利润的古典派思想。

然而，古典派重视生产过程的看法却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坚强地活了下来。他们经常揭露在生产过程中剩余劳动被榨取或者机械生产产生异化的状况，并认为生产过程中的斗争能够终结资本的积累运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下，生产过程就是被资本出卖的劳动力商品的具体的劳动场所。那里的斗争基本上就是改变交换契约条件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会运动将停留在经济斗争的层面。可是，工会运动在根本上只能是经济斗争，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藐视它的存在价值。它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以及改善劳动条件方面做出了贡献。今天，它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据。因此，凯恩斯相对于古典经济学派过分强调了“工资刚性”的“规律”。